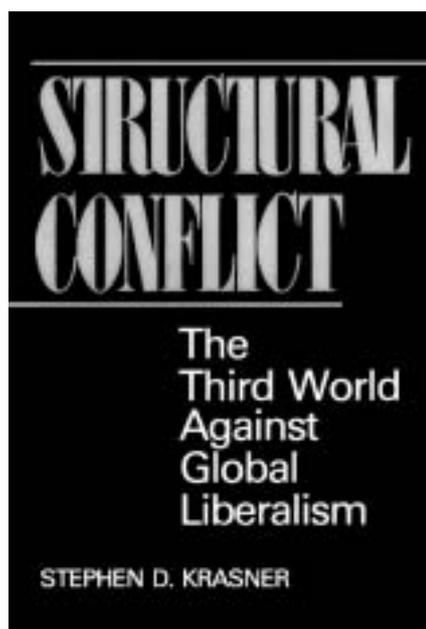


結構衝突下的南北關係

● 李小華



南北關係是冷戰後國際政治理論界一個不容迴避卻又見仁見智的問題。對南北關係的傳統分析方法主要有兩種：經濟解釋法和權力解釋法。克萊斯勒則獨闢蹊徑，提出了修正結構主義。這一視角充分利用了國家權力和國際制度兩個概念。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斯蒂芬·克萊斯勒著，李小華譯：《結構衝突：第三世界對抗全球自由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出）。

南北關係的實質是甚麼？其前景如何？解決之道又何在？這是戰後，特別是冷戰後國際政治理論界一個不容迴避卻又見仁見智的問題。對此，理論界的不同學派提出了各種觀點，其中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克萊斯

勒 (Stephen Krasner) 的《結構衝突：第三世界對抗全球自由主義》一書頗具代表性。該書論點新穎，資料翔實，論證縝密，是南北關係研究方面不多見的佳作。

一 南北關係研究的方法論

對南北關係的傳統分析方法主要有兩種：經濟解釋法 (economic approach) 和權力解釋法 (power approach)。克萊斯勒則獨闢蹊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分析視角——修正結構主義 (Modified Structuralism)，或稱修正現實主義 (Modified Realism)。這一視角充分利用了國家權力 (national power) 和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 兩個概念，一方面承認政治權力在制度創建中的重要性，認為除非得到體系中強國的支持，否則不可能建立起持久的原則 (principle)、規範 (norms)、規則 (rule) 和決策程序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另一方面也認識到制度一旦確立，它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就變得鬆弛起來。業已確立的制度會由於高昂的破壞代價和缺乏替代選擇等原因而產生存在下去的慣性。國際組織內部的影響力分配並不一定反映構成其基礎的國家間權力分配狀

況，一國一票制的決策程序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因而，制度並不一定與構成其基礎的權力分配格局同步變化，它還會受到制度本身的開放程度與理論思潮等因素的影響。

儘管克萊斯勒用了大量篇幅論證其方法論的有效性和相對於「經濟決定論」（這是克萊斯勒對相互依存理論、各種自由主義與人類基本需要學說 [Basic Human Needs] 的統稱）的優越性，並做了大量個案研究，但他的這種方法論還是大有可置疑之處。首先，克萊斯勒自稱借用了沃爾茲 (Kenneth Waltz) 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但在實際應用中卻只出現了體系層次和國家層次兩個「想像」，而沒有對國家內部決策層次的分析；其次，從各種新馬克思主義和相互依存論等其他分析視角看，南北關係本質上是經濟關係，政治衝突只是後果而非原因；最後，克萊斯勒認為在南北關係中，國家對財富的追求會讓位於對權力的追求，經濟因素必然服從於政治因素。但財富與權力，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真能截然分開嗎？關於這一點，另一位新現實主義代表人物吉爾平 (Robert Gilpin) 的說法也許更為中肯：要明確找出國際衝突的「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是不切實際的。正在實踐的政治動機只能用經濟來表達，每一種衝突都是權力的衝突，而權力則依賴於人力、物力和財力」。

二 南北關係的實質與發展中國家追求的目標

克萊斯勒通過對南北關係史的仔細梳理，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

實，對關於南北關係的傳統看法提出了挑戰。傳統觀念認為，南北關係的焦點在於發展中國家的落後狀態，發展中國家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是對其經濟狀況不佳的反應。克萊斯勒卻發現，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無論相對於其歷史上的表現還是相對於北方國家同期的發展狀況，都是很快的。更為有趣的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提出國際新秩序倡議，最激烈地反對自由國際秩序之時，正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最佳的時期。

據此，克萊斯勒提出了兩對核心概念：權威分配模式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與市場導向分配模式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變位權力行為 (meta-power behavior) 與聯繫權力行為 (relational power behavior)。權威分配模式指通過政治權威直接或間接分配資源，而市場導向分配模式則指資源的分配是通過個體的能力和偏好，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得以體現。聯繫權力行為指在承認既定秩序的前提下尋求價值最大化的努力；而變位權力行為則指以改變秩序本身為目的的努力。

不言而喻，發展中國家採取的是變位權力戰略，追求權威分配模式。當前國際體系的主導秩序是戰後在美國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以市場導向為基本特徵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 (LIEO)。因而，南北關係的實質，就表現為國際經濟新秩序 (NIEO) 與自由國際經濟秩序之爭。發展中國家追求的目標，既可能是財富，也可能是政治控制，但如果兩者發生衝突，就會為了控制而犧

當前國際體系的主導秩序是戰後在美國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以市場導向為基本特徵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因而，南北關係的實質，就表現為國際經濟新秩序與自由國際經濟秩序之爭。

性財富，奉行變位權力戰略，追求控制的最大化。

三 南北關係的前景和可能的解決途徑

關於南北關係的前景，克萊斯勒是很悲觀的。在這一點上，他雖與世界體系論和依附論等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起點不同，卻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南北衝突的根源是結構性的，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有實質改善。

當然，克萊斯勒也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他認為三種發展趨勢可能會緩和這種緊張關係。第一，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會獲得足以應付當前國際體系衝擊的國家權力能力 (national power capability)，從而決定性地減緩國內結構上的脆弱性，如中國和印度。第二點饒有趣味，這位國際制度研究的開先河者認為，國際制度，特別是當前國際組織的衰落，是緩和南北間緊張關係的必要條件。第三點與依附論的結論相同，即南北之間脫離關係。因為發展中國家之間權力的不對稱性沒有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那麼大，因而更容易建立起彼此認可的國際制度。

如果說，克萊斯勒對南北關係的描述與解釋還比較嚴密與客觀的話，那麼他提出的緩和南北間緊張關係的三條途徑則要主觀得多。無需繁複的理論演繹，只要證之於南北關係的現實，就可見其偏僻。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南北間相互隔絕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給自足到能置身於世界市

場之外，他所列舉的兩個典型例子中國和印度，目前卻都以盡快融入世界市場為目標了。

四 對本書的評價

應當承認，克萊斯勒在本書中提出的體系，作為政治理論是相當完整的。第一，它有自己的方法論：修正結構主義，它將結構主義與國際制度研究結合起來，較為成功地解釋了國家間權力分配、國際制度的自主性與國際政治結果三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第二，它有縝密的實證分析：在書中第二部分，將其方法論具體應用於國際金融機制、多國公司、交通運輸和全球共同財富四個個案之中，並作了精細的個案分析。第三，它得出了明確的結論：南北衝突是結構性的，是自由國際經濟秩序與國際經濟新秩序兩種變位權力目標之爭。不管同意他的觀點與否，其理論的思辯性仍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從克萊斯勒的理論體系看，有三個最明顯的缺陷。第一，關於行為體理性的命題，克萊斯勒先驗地認為，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像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必然會根據成本—收益原理從事目標最大化的博弈，內部決策程序問題可以忽略不計。後來，克萊斯勒將國家理性的命題擴展到了國家集團，即南方世界和北方世界兩大集團理性地謀求自身的利益。對雙方內部的差異，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第二，克萊斯勒忽視了動態因素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本書的理論

克萊斯勒認為，南北衝突的根源是結構性的，是自由國際經濟秩序與國際經濟新秩序兩種變位權力目標之爭，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有實質改善。不過，他認為有三種發展趨勢可能會緩和這種緊張關係。

起點是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格局及由其所決定的國際制度，沒有考慮到權力這一概念產生的環境和它在內外條件發展中本身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各種趨勢性因素的影響，如高科技的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際社會的觀念與認知方式的變化，行為體通過「學習」獲得的「進步」等因素。

最後，與第一點相聯繫，克萊斯勒聲稱本書的分析方法借用了沃

爾茲的三層次分析法，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卻過重地強調了第三層次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其美國同行、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在理論上更為周全，即既重視國際問題的國內根源，又強調國內問題的國際背景。而克萊斯勒只強調了單向度的影響，沒有探討它們的互動過程。

「時髦」的西美爾？

● 陳戎女



西美爾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李猛、吳增定校：《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乍一看去，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柏林學術界的西美爾 (Georg Simmel) 關心的問題相當地「時髦」(就當下學界所趕的時髦而言)，單單在國內新近編譯出版的《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一書 (以下簡稱為《金錢》) 裏就可看到現代文化、貨幣現象、生活風格、女性文化、性別關係、賣淫活動、時尚、調情心理學等聽上去既新鮮又怪異的論題，這使西美爾全然不像一位嚴肅的哲學家，儘管他是哲學科班出身。西美爾也搞社會學，而且還是當時尚屬新生事物的社會學學科的大力倡導者。是否社會學家就該像「松鼠」(科塞 [Lewis Coser] 語) 般跳躍性地追逐各種時髦現象呢？古典社會學者們肯定不會以為然，可見，不過是西美爾的個人視野獨

據說，與同時代的韋伯、涂爾幹所關注的宏大的建制性社會現象相比，西美爾的視野未免過於瑣細狹小了，因而主流社會學史幾乎沒有給他甚麼機會與這些經典社會學大師相提並論。果真如此？